20 世纪 60 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的外交倾斜

——基于“威胁制衡论”的探讨

周东辰,赵文彬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　要:1961 年,朝鲜分别同苏联和中国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一三角“同盟”关系构建了金日成与中苏之间等距离外交的策略。但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苏关系已逐步走向破裂,夹杂在中苏两个大国间的朝鲜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等距离外交策略,或多或少地向中苏二者之一倾斜。根据沃尔特的“威胁制衡”理论,可以看出朝鲜的外交倾斜主要是受到制衡威胁、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援助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意识形态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中苏两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朝鲜外交倾斜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美日韩同盟对朝鲜的直接威胁,朝鲜不得不在中苏的外交倾斜中寻找平衡。

关键词:中朝关系;中苏关系;金日成;威胁制衡论

中图分类号:K312.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19)05-0031-06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夹杂在其中的朝鲜不得不面临对中苏二选一的局面,整个 60 年代,朝鲜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向中国和苏联倾斜以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朝鲜何以在另外两方破裂的情况下左右逢源?是什么原因促使朝鲜两次改变自己的选择?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朝鲜并未在特定时期彻底断绝与中苏任何一方的特殊关系?本文以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为主要理论方法,分析朝鲜在 60 年代分别向中苏倾斜的原因以及各要素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一、“威胁制衡”理论

史蒂夫·沃尔特就国家为什么结盟以及如何选择盟友这两个联盟原因问题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一书中做了详尽的阐释,被称为“威胁制衡论”[1]。

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来自各方的威胁,这种威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由单一的实力所决定的,而是由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四个方面综合考量的结果:综合实力越强,则威胁越大;地理位置越接近则威胁越大;进攻实力越强,则威胁越大;进攻意图越强,即使实力均等或者偏弱,依旧会被视为威胁。在确定威胁之后,国家应选择不同的盟友来应对这种威胁,国家在选择盟友时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一、制衡或者追随强者。强者通常综合实力较强,因此也会被视为威胁,制衡是指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来对强国加以制衡,而追随强者则是与强国结盟寻求其庇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盟因素。二、意识形态。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中有相似性,因此他们更容易结盟。三、对外援助。对外援助的多少则决定了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联盟的紧密性。四、跨国渗透。一方政府对另一方政府有所谓政治的操控,这种情况下联盟比较容易建立。沃尔特基于以上四种情况提出了大量假设,并结合 1955 年到 1979 年中东地区的主要联盟状况进行了分析,最终他得出以下结论:制衡威胁是缔结国家联盟的最重要原因,它相较于制衡强者的行为更加普遍;意识形态与外部威胁相比并不重要,意识形态的分歧往往会屈服于外部威胁;援助和渗透是结盟的影响因素但是其作用有限。

本文主要基于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来分

收稿日期:2019-06-19

基金项目:2018 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委党校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研究”(18CDCJ03)

作者简介:周东辰(1987—),男,河南许昌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后;赵文彬(1996—),男,山东淄博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析朝鲜60年代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摇摆,并作出如下假设论证:第一,对于朝鲜来说,外部威胁(来自美日韩的威胁)是其主要的结盟或者向盟友靠拢因素;第二,朝鲜60年代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摇摆是受到援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三,朝鲜只是在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间摇摆,而彼此间的特殊关系没有直接破裂是因为外部威胁战胜了援助或者意识形态的分歧。

二、20世纪60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的外交倾斜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在中苏之间一直奉行等距离外交,同时接受双方的支持以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原本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党关系出现了裂痕,之后则一直小"对抗"不断。中苏矛盾的公开化则始于1960年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此时的各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站队的选择,然而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积极拥护中共,一向同中共要好的朝鲜党却站在了苏联一方。在中苏两党分裂的最初阶段,朝鲜依旧想要保持一直奉行的等距离外交,并不愿因为站队的缘故得罪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中的任何一方。为了维护朝鲜的利益,使朝鲜在与中苏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于是在1961年7月6日、1961年7月10日分别同苏联和中国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继续推行自己的等距离外交。

(一)1961—1965年,疏远苏联,向中国倾斜

1961年底之后,由于中苏对朝鲜援助态度的变化使得朝鲜在等距离外交中发生倾斜。1961年,金日成宣布朝鲜将开始第一个七年计划建设。之前的第一个5年计划于1960年提前两年半得以完成[2]。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除了朝鲜人民自己的努力外,也得益于中苏两国的大力支持,因此朝鲜也寄希望于中苏两国的继续支持,然而中苏两国的援助态度却悄然发生着变化。早在1960年,朝鲜便计划落实同苏联制订长期援助和贸易的事宜,由于双方存在着较大的贸易分歧,协议签订之事一拖再拖,最终在12月24日苏方同朝鲜签订了1961到1965年的贸易协定,然而双方在协议开始的第一年就出现了摩擦,苏方在苏朝贸易方面也是斤斤计较[3]。相对于锱铢必较的苏联,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则显得更为无私与慷慨。1961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严重下降,人民生活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中方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提出于1961到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4],以支持朝鲜的七年计划建设。1961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在朝鲜政府并未催促的情况下,国务院发出指示:"对朝鲜出口煤炭是政治任务,一吨都不能少。"[3]1962年,虽然"三年自然灾害"进入最后一年,但中国的经济形势却已跌入谷底。1962年年中,朝鲜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在谈判过程中,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这样说:"凡是我们办得到,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要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过关以后再办。"[3]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之下,1963年11月5日,两国签订了1963年至1967年贸易协定的5个文件,中方几乎从各个方面在不计经济状况的情况下满足了朝鲜的所有要求。

中国无私的经济援助收到了成效。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大会将赫鲁晓夫"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观点系统化,并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新理论,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并且在大会期间借批评阿尔巴尼亚党和"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和"顽固的莫洛托夫分子"来影射中国,中共当时未表态,周恩来提前回国[5]297-306。金日成对苏共二十二大及其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也十分反感,并对苏共在二十二大上对中共的影射和批评十分愤怒,他在1962年3月8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现在,修正主义者的最愚蠢的行动是,对帝国主义竭力奉承和接近,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不和。……同时,他们还给那些拒绝追随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扣上什么"教条主义""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帽子,企图摒弃他们,把他们从社会主义阵营中排挤出去。"[6]309 这是在朝鲜党内会议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一次批判,同时也是对中共的支持,这说明金日成以及他的朝鲜劳动党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同中共站在一起,由此,朝鲜平衡外交开始朝中国一方倾斜。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在20多个政党攻击中共的情况下,朝鲜代表

团团长李周渊站出来明确表态说："如果说对苏共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的话，同样对中国党的态度也是衡量一个党的国际主义。"[7]329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大会对中共的指责，这也是朝鲜党在国际上第一次公开为中共说话。自此之后，朝鲜党开始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包括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支持、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支持中国等。以至于在 1963 年 2 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给左派兄弟党排队时曾说道："朝鲜党、印尼党和新西兰党属于第一梯队，他们敢于替中共讲话。"[7]334 朝鲜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一边，这无可避免地引起苏联的反应，1962 年，苏联决定暂时延缓对朝鲜的军事以及经济援助，并于 1964 年正式停止对朝鲜的军事援助。但苏联的逼迫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得朝鲜更加倒向中国。自此到 1965 年，中朝关系稳步发展，苏朝关系持续恶化，朝鲜等距离外交已不复存在，外交的天平向中方倾斜。

（二）1965—1969 年初，与苏修好，疏远中国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新上任的苏共领导人转变外交方针，积极恢复同朝鲜的关系；而中共因为受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的影响，使朝鲜与中国渐行渐远。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共寄希望通过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修复中苏关系，周恩来于 1964 年 10 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朝鲜、阿尔巴尼亚等 5 国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希望他们能派遣代表团赴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8]424。除阿尔巴尼亚外，朝鲜等四国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前往祝贺，中共也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中共这次祝贺并没有为中苏关系恢复带来进展，而朝苏关系却迅速升温。由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其政治重点大多放在欧洲，而对东亚并不是"十分关心"，而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调整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重点，从欧洲向东亚转移，一方面为了呼吁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抗美，另一方面也为了同中国争夺东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进一步同中共"唱反调"。苏共的这种政治转移是金日成愿意看到的，虽然中国在"第一个七年计划"期间对朝鲜进行了几乎无偿且十分重要的援助，但是朝鲜如果借此契机能够恢复同苏联关系，同时得到中苏两国的援助无疑对朝鲜的经济建设是最有利的。1965 年 5 月，朝鲜总参谋长崔光访苏，通过谈判，苏联恢复了停止三年的对朝军事援助[3]。苏朝关系转暖。朝鲜又开始试图在中苏两国之间开展左右逢源的等距离外交。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中朝双方在对待苏联态度上的不同以及中国受到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朝关系开始疏远。1966 年 3 月，中共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中苏的组织关系正式切断[5]。然而金日成依旧派遣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赴苏。并且在同年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大谈团结与友谊[9]，苏朝关系迅速转暖。1966 年 9 月 9 日，陈毅副总理在朝鲜临时代办招待会上提出："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10]。1965 年 9 月 3 日，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具体阐述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并提出要在世界范围内加以推广。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左"倾错误思潮开始蔓延，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想法被进一步行动化。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布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使得驻外机构成为了宣传文革成果的阵地[11]11。虽然毛泽东并不愿损害中国的对外关系，但这种情况还是严重影响了我国正常的外交活动，也引起了包括朝鲜在内的各国不满，1966 年 10 月 5 日，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中指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采取极端行动。"[12]476 全文未提及中国，却是影射中共，表达对"文革"以及中国"左"倾的不满。1966 年 10 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和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他说：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反对机会主义而犯否定团结的左倾错误，也不应该因为维护团结而犯放弃同机会主义斗争的右倾错误[13]556-557。1967 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北京出现大字报，公开散布朝鲜内部发生对金日成的"政变"的不实消息，并出现攻击金日成"走修正主义道路""是赫鲁晓夫的门徒"[14]等不当言论。自此之后，中朝双方外交往来急剧减少，据笔者掌握的中方资料统计来看，1965 年中方报刊对中朝关系的报道有 47 条，1966 年降为 16 条，1967—1969 年三年共 20 条，且多数为客套性的

祝福[15]50-60。这种情况在1969年下半年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崔庸健访华之后才有所好转。1965—1969年初,随着苏朝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左”倾错误的影响,朝鲜的外交天平偏向苏联。

三、影响朝鲜与中苏外交关系的原因及因素分析

朝鲜战争之后,朝中苏三国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变化,尤其在中苏分裂之后,中苏双方都想拉拢朝鲜站在自己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批判,然而朝鲜却处处以自身利益为主导,通过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外交倾斜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根源:制衡最具威胁的国家(联盟)

制衡或追随强者是国家在选择盟友时的一个重要考量,根据沃尔特“威胁平衡”理论,制衡是为了联合他国抵消对本国最大的威胁,而朝鲜与中苏的交好以及60年代在朝中、朝苏之间的外交倾斜也是基于对威胁的制衡。

首先,基于朝中、朝苏互助关系的建立便是对美日韩同盟这个朝鲜最大威胁的制衡。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半岛“划线而治”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在金日成看来,朝鲜半岛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非现在的“南北分治”。60年代初韩国的混乱也使得金日成看到了希望,然而朝鲜虽然政治形势大好但是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1960年,“日韩会谈”重启,日韩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1961年,美国同韩国张勉政府签订了《韩美经济技术协定》,这使得美韩同盟联系进一步加强[16]。面对美日韩同盟的加强,朝鲜也要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关大国的联系,予以回击,1961年,朝鲜分别同中、苏两国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维护,也是对美日韩同盟的一种示威,朝中苏三者特殊关系的建立与加强正是朝鲜对美日韩同盟的一种制衡。

其次,60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的外交倾斜也是对美日韩同盟这个最大威胁的回应。传统认为,中苏对国际共运的分工是:中方多做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运动,苏联多承担些西方义务[17]298。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直接参与了对美韩的作战,并且在地缘和历史上朝鲜同中国的联系较苏联更为密切,因此在60年代前期,朝鲜为实现半岛统一的愿望,也同中国更近一些。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后,赫鲁晓夫的“三合路线”提出,则使得想要统一半岛的金日成大为不满,苏联这种乞和的策略是朝鲜所不能接受的,而此时的中国却依旧支持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抗斗争,这与金日成的想法达到一致,朝鲜为了制衡美日韩同盟这个威胁,不得不疏远苏联,同中国站在一起。1965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金日成清醒地意识到,由于朝鲜偏向中国,导致朝鲜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朝鲜似乎正在失去这个盟友,毕竟对于朝鲜来说,美日韩同盟才是自己最大的威胁,而非苏联。与此同时,日韩历时14年的谈判宣告结束,《日韩条约》签署,美日韩同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仅凭中朝两国显然无法与美日韩同盟抗衡,因此朝鲜积极恢复同苏联的关系,以求再次在等距离的外交状况下保持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来制衡美日韩同盟的外部威胁。

因此不管朝鲜在60年代的外交天平如何倾斜,他的出发点总是基于外部威胁(美日韩同盟),不论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如何选择,都是为了符合本国利益,这也是朝鲜只是对中苏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外交倾斜,而非和一方接近而直接放弃另一方的原因。朝鲜不能同中苏一样,直接同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决裂,朝鲜需要中、苏两方的支持来实现威胁制衡,这也是朝鲜为何在60年代虽然摇摆于中苏之间而最终却要坚持其平衡外交的原因。

(二)重要因素:意识形态

沃尔特在其《联盟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只有在处于安全环境时意识形态才能起到决定作用,否则还是以军事威胁为主。然而考虑到二战后两极格局的大背景,在考察60年代朝鲜在中苏之间外交倾斜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不同的结论,意识形态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朝中苏三国的特殊关系本身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二战以后,世界分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考量成为了两大阵营中各国在处理其双边关系的关注点。朝鲜和中国建国都是受到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朝中苏三党同源,朝中苏三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朝中苏社会主义同盟是对抗美日韩资本主义同盟的有力武器。在这种意识形态与党际国际关系相互交织的密切联系下,朝中苏三者

建立特殊的关系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次,60 年代朝鲜外交在中苏之间的摇摆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经过 30 多年建设时期的发展已经改变了革命思想,认为应当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争、和平过渡”,而不是继续采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政府;而中共和朝鲜劳动党持不同看法,朝鲜和新中国分别于 1948 和 1949 年建国,特别是 50 年代还经历了同资本主义的直接战争——朝鲜战争,并取得了胜利,因此中朝两国还没有摆脱革命意识,依旧信奉革命,因此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了中朝两国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分歧。60 年代前期,中苏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朝鲜面临站队,而苏共二十二大使得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三合路线”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出使得金日成大为不满,在这种“和平路线”之下,再加上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差强人意的表现以及极其霸道的大国沙文主义使得金日成更为不悦,这种国际共运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超过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开始公开抨击苏共的修正主义,积极同中共站在一起,以此来维护国际共运的正确道路,中朝因为有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而坚定地站在了一起。60 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中共认为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执行的依旧是“三和路线”,因此继续同苏联作斗争,而朝鲜却恰恰相反,朝鲜认为,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其政策是对赫鲁晓夫三和路线的搁置甚至摒弃,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与美的全面竞赛以及对美霸权的全面挑战,是转守为攻的新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理念也与朝鲜一直坚持的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加上中共此时受到“文革”的困扰,对外事务方面也受到了一些野心家的利用,使得此时的中朝关系转冷。

朝中苏三者的互助友好关系开始于意识形态,也变化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左右朝鲜在中苏之间外交倾斜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一种手段:经济援助

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中认为,提供经济援助能够对联盟的建立发挥作用,并且援助可以加强盟友间力量并维护其共同利益。而且提供援助会被看做是传递友好意图的途径,而拒绝提供援助可能被看成敌意的信号。这种观点在朝鲜于中苏之间的外交摇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朝鲜在朝鲜战争之后,一直奉行等距离的外交政策,同时接受中苏两个国家的经济援助,用以发展本国经济,而在中苏面临分裂时,为了使朝鲜站在自己一方,中苏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但是,双方的态度大不相同。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不求回报,尽自己所能使得朝鲜在双边贸易中得利,以此来拉拢朝鲜;而苏方则是有所保留,尽量在保证贸易顺差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援助,有时对援助也是锱铢必较,在 1962 年朝鲜公开站在中共一方时,苏联也延缓了对朝鲜的援助,并且于 1964 年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这使得朝鲜更快地倒向了中国的怀抱。之后在克里姆林宫易主和中朝发生分歧期间,苏方恢复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这使朝鲜在得到中国援助的同时也能得到苏联援助,这是金日成希望看到的,这也促使朝鲜在 60 年代中期一度恢复等距离外交政策。

经济援助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朝鲜更希望同时得到中苏两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经济援助仅仅成为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经济援助不能同制衡威胁和意识形态一样成为主导朝中苏关系的重要原因。

结语

20 世纪 60 年代是国际共运分裂的时期,朝鲜为了本国自身发展,试图在中苏之间开展平衡外交以获取最大利益,然而由于外部威胁、意识形态以及援助的变化使得朝鲜不得不向中苏其中一方倾斜。

朝鲜不论在中苏之间如何摇摆,其基于的是对美日韩同盟这个外部威胁的制衡,由于中苏对美日韩同盟的态度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赫鲁晓夫“三和”路线提出之后,使得朝鲜为本国安全考虑,同中国站在一方。然而在朝鲜意识到自己的主要威胁是美日韩同盟而非苏联之后,朝鲜便积极同苏联改善关系,继续在中苏之间保持均衡外交。可以说,朝鲜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对于美日韩同盟这个威胁的制衡。

意识形态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构建互助关系的重要纽带。当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朝鲜意识形态相左时,朝鲜便向中国倾斜,反之则向苏联倾斜,这种外交倾斜实质上是中苏两国同朝鲜自身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

经济援助在朝鲜的外交倾斜中起到了一定作

用,然而并不能像制衡威胁和意识形态一样,成为主导因素,尽管中苏对朝鲜的援助态度不尽相同,但是朝鲜更想要两者的共同帮助,这也是朝鲜无论如何倾斜,最终都要在中苏之间寻求平衡外交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朴金哲.朝鲜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斗争的十五年[N].人民日报,1960-08-15.

[3]董洁.中苏分裂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61—1965)[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4).

[4]进一步巩固发展中朝友谊,增强社会主义阵营伟大团结和力量[N].人民日报,1960-10-14.

[5]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6]金日成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9]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 年的中朝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10]陈毅副总理在朝鲜临时代办会上发表讲话[N].人民日报,1966-09-10.

[11]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 2 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2]金日成.关于我国革命的主体[M].平壤:外国文出版社,1975.

[13]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朝鲜劳动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4]董洁."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1966—1970)[J].冷战国际史研究,2014(2).

[15]刘金质,杨淮生.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性文件汇编(1949—1994)[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6]成晓河."主义"与"安全"之争:六十年代朝鲜与中、苏关系的演变[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2).

[17]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Inclin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60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reat Balance Theory"

ZHOU Dongchen, ZHAO Wenb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00, China)

Abstract: In 1961, North Korea signed *Soviet-North Korea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and *China-North Korea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 respectively, and the triangle "alliance" relations constructed Kim Il-sung's polic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division, and North Korea, interspersed between the two great power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to change the policy of equidistant diplomacy, being inclined to one of them more or less. According to Walter's "Balance of Threat" theory, we can see that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inclin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threat of check and balance, ideology, and economic aid. Id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China's and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dex, and North Korea has to find the balance facing the direct threat from the alli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Key words: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Sino-Soviet relations; Kim Il-sung; threat balance theory

(责任编辑　雪　箫)